

《雍和宫佛教文化研究》丛书

YONGHEGONG
YU BEIJING JINGSHEN
YANJIU

雍和宫与北京精神研究

李德成 ©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雍和宫佛教文化研究》丛书

雍和宫与北京精神研究

李德成 ©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和宫与北京精神研究 / 李德成著.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4.12

(雍和宫佛教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80253-687-6

I. ①雍… II. ①李… III. ①雍和宫—喇嘛宗—宗教文化—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北京市 IV. ① B947.21 ② D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0390 号

雍和宫与北京精神研究

李德成 著

责任编辑 永红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1.25

字数 238 千字

印数 3000

定价 56.00 元

书号 ISBN 978-7-80253-687-6 / D · 62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发行部电话: 010-64892902

《雍和宫佛教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 问：嘉木扬·图布丹 胡雪峰

主 编：鲍洪飞

副主编：刘 军 阿·巴德夫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春江 王 迪 天 移 嘉木扬·凯朝

李立祥 李德成 苏文涛 周润年

高 欣 斯琴巴特

序

藏传佛教皇家寺院雍和宫，“改宫为寺”已经整整 270 周年了，这是历史留给今人的珍贵文化遗产。

雍和宫前身“雍亲王府”，与他的主人雍正正在“康乾盛世”中发挥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样，为将“盛世”推到更高阶段，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

胤禛居府 24 年，虽自诩“身处繁华，……自觉清远闲旷，超然尘俗之外”，平生“澹泊为怀，恬静自好，乐天知命，随境养和”，为示其逍遥悠闲之态，还编撰有《雍邸集》与《悦心集》，但两次随父出巡，目睹“盛世”掩盖之下的官场贪污贿赂、欺隐造假、官官相护之种种陋弊，以及社会生活中庶民的“沉重税负”和“等级制度”的存在，他寓此“居潜寂观、冷静思索、韬光晦迹、运筹帷幄”，为日后登上皇位进而实行一系列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雍正即位后，其重用人才、整肃庸吏、惩治腐败；加强集权，设置“军机处”亲理军政要务；废除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贱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兴修水利、改土归流、巩固边疆等等一系列举措，无不是在雍王府中运筹的结果。

乾隆八年（1743），根据“凡先帝临御燕处之适且久者多尊为佛地”的惯例，乾隆帝经与三世章嘉活佛深入探究后，次年就敕重资“调拨库银”开始实施“改宫为寺”。用了大约一年时间，

“修建起围墙坚固、周围宽广的大经堂”，“此外还有显宗、密宗、医学、声明诗律扎仓等四个扎仓，以及专供僧伽居住的大小僧舍。寺院殿堂众多，规模宏大，设计工艺巧妙，犹如将祇陀林寺搬到了中国大地一般”（《章嘉传》）。至此，一座恢宏、壮丽的藏传佛教皇家大寺展现在京都东北角，经章嘉、赤钦两位活佛率众僧举行三天三夜的开光仪式，一座具有“教习正规、三宝俱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圆满建成。乾隆帝亲赐寺名“噶丹敬恰林”（意为兜率壮丽洲），将雍和宫带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并使其走向辉煌。

雍和宫自改宫为寺后，不仅承载“弘扬佛法、利乐众生”这一宗教使命，还被赋予了“安众、治理、稳定蒙藏地区，巩固统治”的政治意义。为此，清廷直接参与管理，使雍和宫除具备一般寺院的宗教功能之外，还承担了“联系边疆，灌输政策，履行怀柔之道”的义务。从而确立了雍和宫“首位皇家御用寺院”的定位以及维系蒙、藏地区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枢纽”地位。

典籍中对于雍和宫的最早记述，见乾隆七年（1742）内廷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开始编纂，嘉庆十一年（1806）朱格抄呈进本“官书”《国朝宫史》。“改宫为寺”30年后编纂、41年之后刊出的《日下旧闻考》，又对《国朝宫史》中的记载进行了详细的补记和注释。有关标记雍和宫的舆图最早出现在1750年《乾隆京城全图》中，其时雍和宫中路最后一座主体建筑万佛阁恰好完工，“全图”完整地标记了当时雍和宫的建筑全貌。然而，社会各界对于雍和宫的“研究”以及本寺院僧、俗自身展开的“研究活动”，则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资料匮乏而步履维艰，导致清代、民国以来的研究性、介绍性文章或书刊并不算多。民国时期高僧释妙舟的《蒙藏佛教史》，专家许道龄的《北京佛教之传入及佛

寺之发展》，学者张江裁、许道龄的《北平庙宇碑刻目录》等专著，学术价值较高。

最值得称道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雍和宫导观所”创编的介绍、研究性刊物《雍和宫导观所刊物》。该刊物先后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民国二十四年（1935）和民国二十六年（1937）编辑出版 3 期。关于创办此刊物的目的，第一期序言中记载道：“雍和宫原系清世宗潜邸，乾隆时改建庙宇，为黄教喇嘛礼佛诵经之所。庙中所有佛像法物多珍异之品，或颁自内府，或来自异域，均为世人所罕觐，于我国历史及宗教关系重要。民国以来，乃有导观所之设，任中外人士入内参观，惟所得而见者，仅当前陈列之品。且仓促寓目，亦多未能详尽。虽曾印佛像法器说明书及刊物册二种，惜图与说离而为二，仍苦难于明了。夙冈民国二十有二年接任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乃呈请盘查雍和宫所存器物。奉会令准行，并派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暨蒙藏学校校长共同盘查。凡庙中所陈设及库内所保存逐件检点，注册列表详为登记，使历久凌乱无稽之物品一举而廓清之，以副中央崇视黄教保护古物之意。并防以前遗失盗窃之弊，更将所出刊物加以改善，所有佛像法器皆陆续摄影刊印，附以说明，于各物之名称意义详为解释。其中蒙藏文字皆译以汉音，俾览者按图索解，一目了然。期我遐迩传播不胫而走，俾研稽秘典之士藉作参考之助，其亦有合于阐扬黄教之旨欤。”简单来说，创办此刊物，就是为了保护文物，研究和宣传雍和宫及蒙藏佛教文化。

该刊物第一期按佛像、经卷、法器、古物和供器 5 个部分，收录了雍和宫各殿堂供奉、陈列或收藏的珍贵文物 325 件，并附加简要说明，对主要佛像、唐卡和法器还配发了照片 45 幅。二

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分别介绍了雍和宫、正觉寺、西黄寺、护国寺、妙应寺、普度寺、嵩祝寺的主要殿宇建筑、佛像、法物和雍和宫跳布扎的情况，并记述了“平热”（北京与承德）地区三十余座寺庙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建筑格局、殿宇佛像、碑刻文物、保存状况等。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期除继续介绍各寺院情况外，还刊发了《西藏黄教之由来与达赖班禅之略历》《雍和宫内部之组织与四学殿概况》《雍和宫喇嘛待遇之今昔观》《雍和宫殿宇僧舍及其他建筑物述要》《雍和宫导观所沿革记》等综述性、研究性文章，学术性明显增强。

《雍和宫导观所刊物》虽仅出版3期，但其意义和价值极为显著，不仅对雍和宫，对其他相关寺庙，乃至北京地区佛教寺庙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参考价值。也可以说，它的编辑和出版，正式开启了雍和宫“自身”学术研究之先河。

此外，清代和民国时期雍和宫僧人的宗教研究活动亦一直没有中断，罗布桑楚勒特木、乌力吉巴图、拉森乌力吉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3位。

罗布桑楚勒特木是察哈尔镶白旗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雍和宫学成后返回家乡从事宗教、著述等活动。他不但精通蒙古文和藏文，而且对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和研究。先后撰写了《青册》《察哈尔格西全集》《祝颂词》《甘露》等多部专著，以及介绍印度的英雄史诗《罗摩衍那》和藏族文学史诗《格萨尔》等的文学作品。后又在察哈尔查干乌拉藏传佛教寺庙兴办蒙古文印经所，刊印了大批经书及蒙古文《西游记》等，成为蒙古族著名学者、文学家、出版家。

乌力吉巴图是雍和宫著名藏传佛教历算学家。他所著《第

十四丁卯周的甲子年(1864)历书》，完整地绘出了我国 18 个省首府和蒙古 22 个旗的北极高度（即纬度）和距京都的东西偏度（即经度差）。这部蒙藏“时宪历”后被众多寺庙定为学习时宪历课程的教材，其推算日、月食的方法也被载入每年编制的藏文年历中。

时轮殿僧人拉森乌力吉根据蒙藏“时宪历”及凭借多年观天测候经验，曾经准确地预测并算出民国三十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1941 年 9 月 21 日）发生的日全食。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雍和宫一直作为配合国家外事和民族工作的宗教场所内部开放。这一期间，全面记述雍和宫的专著当属金梁老先生编纂的《雍和宫志略》。该书是一部系统介绍雍和宫的志书，全书共分 11 章，分别介绍了雍和宫的缘起，喇嘛组织的结构，僧人的管理、教育、待遇，以及建筑、佛像、碑石、法物等。虽然书中存在着些许错误和瑕疵，但至目前为止仍是唯一一部比较全面、翔实的雍和宫志书。“文革”期间，雍和宫被迫关闭，活动停止，僧人多数流失。1981 年春节，全面修缮后的雍和宫重新对外开放。昔日的皇家寺院，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雍和宫的学术研究工作亦再次起步和发展。

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大量介绍雍和宫的文章开始见诸京城报端，雍和宫的研究也像春芽般萌发。1983 年年初，阿·巴德夫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天地》杂志上发表文章《雍和宫》。同年，他还代表雍和宫出席“承德避暑山庄建庄 280 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宣读、发表论文《雍和宫与承德外八庙》。1985 年，魏开肇出版专著《雍和宫漫录》。1987 年，尹育政出版《雍和宫》，1989 年和 1991 年又分别出版《雍和宫掌故与传说》《寺庙奇观（雍和

宫)》两书。

90年代以后,雍和宫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全面展开。嘉木扬·图布丹和胡雪峰两位住持积极倡导并率先垂范,佛学研究硕果不断涌现。图布丹住持翻译出版了蒙藏合璧的佛学词典《智慧之源》,与人合作校订了藏文《四部医典》,撰写出版了藏文版《释尊本生传记》(又称《菩萨门经》)《吉祥果聚塔缘起及佛塔简论》《乌兰活佛传》等多部著作。胡雪峰住持单独或与人合作撰写、编译出版了《藏汉蒙佛教日诵》《藏汉蒙对照无上瑜伽部大威德金刚十三尊成就仪轨》《藏汉蒙对照佛教语法辞典》等著作。为了纪念雍和宫改寺250周年,探究其“改宫为寺”的历史背景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994年10月6日~8日,雍和宫管理处邀请在京的41位藏学专家,举办了宫改寺25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黄明信、王辅仁、王尧、陈庆英、姚兆麟等25位学者在会上宣读论文。会后,由中国西藏杂志社以增刊形式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发行。这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和文集的问世,将雍和宫及北京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后二十余年间,常少如主编的《藏传佛教古寺雍和宫》;管理处主编的《走进雍和宫》;牛颂主编的《雍和宫唐喀瑰宝》《雍和宫佛像宝典》《心系雍和——纪念雍和宫对外开放二十周年专辑》《雍和宫》;黄崇文的《历代班禅与雍和宫》;陈观涛的《话说雍和宫》;马兰、李立祥的《雍和宫》;徐新华的《雍和宫蒙藏佛教造像艺术》;胡雪峰、鲍洪飞主编的《雍和宫的木版佛画》;邹爱莲、鲍洪飞、韩永福主编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以及译注《雍和宫——北京藏传佛教寺院文化探究》等著作、文集和数种《雍和宫》画册的相继问世,使雍和宫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范围

大大拓宽，系统性明显增强。其中，牛颂主编的《雍和宫》一书，对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雍和宫的历史变迁、高僧大德及其贡献，以及建筑、佛尊、唐卡、佛事活动与教育等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总结和探讨研究，全面性、系统性均超过以往成果。译注《雍和宫——北京藏传佛教寺院文化探究》，系美国汉学家费迪南德 D. 莱辛 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撰写的一部介绍和研究雍和宫建筑、佛像、唐卡、法物、法器和佛事活动的著作。2004 年，雍和宫发现该书的复印本后，辗转联络国内外知情者，最终与其版权所属机构——瑞典民族博物馆暨斯文·赫定基金会取得联系，了解到了该书的背景及相关资料的重要信息，并于 2008 年将其翻译成中文正式出版。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发行，不仅大大拓宽了雍和宫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视野和范围，而且开启了国际合作的新篇章。鲍洪飞等主编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是雍和宫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精诚合作的鸿篇巨著，多达 24 册。全书所辑俱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清代雍和宫的汉文、满文、蒙古文和藏文档案史料，价值和意义巨大。该书从档案的查阅、整理到编辑出版，工程浩大，凝聚了众多人士的汗水与心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为了积极倡导人间佛教，促进社会和谐，帮助和引导广大信众更好地了解佛教、了解雍和宫，以“认识自我、感恩他人、奉献社会、从我做起”的理念，慈悲做好人、智慧做好事，以“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的入世精神学习和修持佛法，充实身心，储存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造福众生，2010 年 10 月，胡雪峰住持主持创办了《雍和宫》期刊，每年编辑发行 4 期。该刊坚持大众化、知识化、史料化、学术化和浅入深解、通俗易懂的办刊原

则，开辟了佛教文史、佛学思想、般若智慧、法师说法、佛海泛舟、雍和佛事、雍和史话、雍和文化、雍和文物、人生感悟等栏目，刊登发表了大量文化研究、教义阐释、学修感悟等类型的文章，为广大僧俗信众、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与好评。

为了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进一步推动雍和宫历史和文化研究，全方位、多角度地解读雍和宫的历史与现状、修学与教育、佛事与高僧、建筑与典藏，深入挖掘其丰厚文化内涵，总结雍和宫在爱国爱教、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宣传祖国历史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2012年3月，雍和宫启动了规划课题——“雍和宫佛教文化研究”首批6个项目：雍和宫与北京精神研究、雍和宫与北京文化研究、雍和宫修学与教育体系研究、雍和宫佛教节日与法事活动研究、雍和宫历代高僧研究、雍和宫与蒙藏地区关系研究。2013年启动了第二批4个研究项目：雍和宫历史地位研究、雍和宫造像艺术研究、雍和宫法器法物研究、雍和宫匾额楹联碑刻研究。为确保研究水平和质量，课题运作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的形式，吸收和整合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实施。如今，各项研究正在进行之中，第一批书稿已陆续完成并开始审校和出版。在此，特别感谢各位作者的辛勤劳动与付出。

今后，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其他研究项目，预计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将形成和推出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力争将雍和宫的文化研究提高到一个涵盖面广泛、学术水平较高、原创性和创新性显著的新高度、新水平。

《雍和宫佛教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4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雍和宫与北京精神 / 1

第一节 雍和宫的历史地位 / 1

- 一、雍和宫是内地藏传佛教的主要宗教中心 / 3
- 二、雍和宫是内地学经组织最为完备的藏传佛教寺院 / 21
- 三、历史上雍和宫具有内地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管理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 24
- 四、历史上雍和宫是中央政府联系蒙藏地方的政治纽带 / 28
- 五、历史上雍和宫是清政府宣化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教育基地 / 31
- 六、雍和宫是新中国研究贯彻藏传佛教政策的重要基地 / 32
- 七、雍和宫是北京联结多民族的文化纽带 / 37

第二节 北京精神的特点和作用 / 41

- 一、北京精神是北京历史文化优良传统的高度提炼 / 43
- 二、北京精神是北京城市品格的集中体现 / 44
- 三、北京精神是打造“文化之都”的强劲动力 / 45
- 四、北京精神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内在条件 / 48
- 五、北京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 / 49

第三节 雍和宫与北京精神的关系 / 54

一、北京精神与雍和宫精神的相互影响和塑造 / 56

二、雍和宫精神是北京精神的具体体现 / 58

三、雍和宫精神与北京精神的互动共进 / 60

第二章 雍和宫的爱国传统 / 63

第一节 北京精神的爱国内涵 / 63

第二节 佛教的爱国主义思想 / 67

一、佛教的护国思想 / 68

二、佛教的忠国思想 / 71

三、佛教的报国思想 / 75

第三节 蒙藏佛教的爱国主义传统 / 83

一、藏传佛教的爱国主义传统 / 83

二、蒙古佛教的爱国主义传统 / 103

第四节 雍和宫的爱国传统及其与北京精神的关系 / 129

一、雍和宫爱国主义传统的内涵 / 129

二、雍和宫的爱国传统与北京精神的关系 / 143

第三章 雍和宫的创新精神 / 148

第一节 北京精神的创新理念 / 148

第二节 佛教的创新思想 / 150

一、佛教的“诸行无常”教义 / 151

二、佛教的“正见”法门 / 153

三、佛教的“契理契机”思想 / 156

第三节 雍和宫的创新精神及其与北京精神的关系 / 160

一、雍和宫创新精神的内涵 / 160

二、雍和宫的创新精神与北京精神的关系 / 183

第四章 雍和宫的包容情怀 / 189

第一节 北京精神的包容性格 / 190

第二节 佛教的包容思想 / 193

一、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 / 193

二、佛教的无分别心思想 / 195

三、佛教的和合精神 / 197

四、佛教的圆融思想 / 201

第三节 雍和宫的包容情怀与北京精神的关系 / 203

一、雍和宫包容情怀的内涵 / 203

二、雍和宫的包容情怀与北京精神包容特征的关系 / 242

第五章 雍和宫的厚德本愿 / 246

第一节 北京精神的厚德品质 / 246

第二节 佛教的厚德理念 / 249

一、佛教的慈悲理念 / 249

二、佛教的利他精神 / 253

三、中国佛教的“人间佛教”思想 / 254

第三节 雍和宫的厚德本愿及其与北京精神的关系 / 256

一、雍和宫厚德本愿的内涵 / 256

二、雍和宫的厚德本愿与北京精神厚德品质的关系 / 280

第六章 雍和宫与北京精神的启示 / 289

第一节 雍和宫是北京精神建设的积极参与者 / 290

第二节 雍和宫是展现和践行北京精神的特殊窗口和舞台 / 295

第三节 雍和宫与北京精神的关系随时代发展将具新内涵 / 298

第四节 雍和宫与北京精神在北京文化发展繁荣事业中的历史责任 / 305

附件一 雍和宫历史大事记 / 310

附件二 参考书目 / 324

第一章 雍和宫与北京精神

雍和宫的历史地位决定了雍和宫的历史作用。雍和宫是北京精神在特殊领域的独特缩影，也是展示北京精神的独特窗口。在北京精神和雍和宫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同时以爱国爱教、弘扬正法、厚德包容、与时俱进、服务社会、利益人群为核心的雍和宫精神的主要内涵也是北京精神的具体体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雍和宫精神与北京精神仍将互动共进。

第一节 雍和宫的历史地位

雍和宫于乾隆九年（1744）由雍正皇帝曾居住过的王府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是清代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由理藩



雍和宫藏释迦佛